

第二章 镇压革命与惩治反革命

第一节 晚清、民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

晚清朝廷腐败,对外忍辱求和,卖国苟安;对内镇压革新变法,维护没落的封建专制,激起全国民众奋起反抗。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以后,1900年,全国又兴起义和团运动。1901年,四川义和团高举“灭清、剿洋、兴汉”义旗,频繁发动武装斗争。四川总督奎俊调集十余营旗军围剿,下令清兵“捕杀一匪奖银五十元”。于是,兵勇四出,每日逮捕义和团和习拳乡民十数人至数十人,不经审问即斩首示众。奎俊的血腥镇压遭到义和团的强烈反抗,义军前仆后继,攻势愈猛,清廷将奎俊免职。1902年十月,新任总督岑春煊率领晋军抵达成都,即在北门外屠杀义军俘虏100余人,表示其镇压人民反清斗争的决心。义和团首领廖观音率领各地义军攻打成都,其先头部队曾攻入城内袭击总督府。岑春煊一面调集全川军队、练勇,加紧围剿、搜捕活

动,一面派出大批便衣密探,收集义军情报,诱捕义军骨干人员。义和团因指挥、联络不善,被清军分割击溃。当年十一月,廖观音和随身将士被清政府捕获,枪杀于成都。义和团将士先后有千余人英勇牺牲,受株连者达数万户。

1911年,因清政府对外出卖川汉铁路主权,激起民众愤怒抗议。六月十七日,“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遵照清廷密令,以通知保路同志会领导人到总督府看邮传部电报为名,诱捕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9人。接着宣布解散保路同志会,查封川汉铁路公司及宣传保路的报刊。后又下令巡防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的民众60余人,打伤700余人。

1914年,四川总督胡景伊追随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他首先发布了“查

禁乱党令”，指示省会警察局长余司礼汇集名单，逮捕了《四川民报》总编谭创之及同盟会领导人朱山、余栋成等数十人，查封了国民党党部，杀害了国民党川籍省议员张捷先、徐回天、李俊侠等。另有数千名国民党员被通缉查办。

192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在胜利挺进的时候，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进行反共“清党”运动，实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灭共方针。四川军阀刘湘积极投靠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年3月31日，重庆各界群众在打枪坝举行“抗议英军舰炮击南京罪行大会”。刘湘命令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负责镇压，王事先派便衣特务混入会场作内应，然后军警包围、冲进会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余人，逮捕100余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组织委员冉钧遭逮捕杀害。驻成都的24、28、29三军联合办事处，为适应蒋介石“清党”需要，成立了“四川省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特务机关，并控制了城防司令部、警察局、团练局及武装执勤部队，专事密查共产党及进步人士活动。1928年，成都学生发起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反劣币”斗争，四川军警团联合办

事处处长向传义，率领军警宪特人员包围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川大法政学院，逮捕师生100余人。内有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成都市委委员李正恩、龚堪慎，成都大学特支书记钱芳祥、成都市农委委员张博诗等14人，被枪杀在成都下莲花池。1930年8月，刘湘在二十一军军部设立“特务委员会”，并令其防区各市、县成立“清共委员会”，加强反共活动。1931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乘机将二十一军特委会扩大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部特委会”，负责督导全川的“清党”、反共活动。1933年，刘湘接任四川善后督办，特委会再度扩大，更名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该会办有《清共半月刊》、《清共月刊》、《光明之路》等7种反共刊物，制造反共舆论；建有侦缉队和一些县支队，负责对共产党人进行调查、执行逮捕等特别任务。先后破坏了中共四川省委、团委、川东军委及一些县委。刘湘的特务组织在历时7年里，曾是四川的反共主力。

1933年，国民党中央派曾扩情来川与刘湘联络，在重庆成立“国民党四川省特派员办事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派苟怀谦、宋天问到重庆，在特派员办事处设立特务室，利用刘湘原清共委员会的特务分子，发展特工组织，建立特务网络。同年夏，力行社特务处派张树良、何龙庆为成都、重庆

直属通讯员开展反共特务活动。1935年1月,复兴社特务处派陈绍平来川建立重庆特务组,后扩改为委员长重庆行营调查科,向成都、西康等地发展特务组织,搜集共产党和各政治团体活动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仍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为了反共和镇压民众抗日运动,极力强化“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机构和职能,以重庆为大本营,向全国伸展其特务网络。中统在西康、四川两省党部建立了调查统计室,并设立了重庆实验区;军统设立了川康区和重庆特区。在川康各地广布特务组织。1940年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为了指挥军政警宪联合反共,成立了“四川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后改为“特种委员会”。所属秘书室由军统掌握,情报组由中统掌握,行动组由警察、宪兵担任,宣传组由三青团负责。军统局长戴笠还先后与美国特使梅乐斯和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和“特种警察训练班”,由美国提供先进的武器和通信装备,并派教官帮助训练特务骨干2000余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凭借美国

的器材装备和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积极进行反对共产党和铲除异己的活动。仅在重庆就派出千余名特务混入文教、新闻、邮电、工会等系统,收集党派、政团、工运、学运等情报。特务机关把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及周恩来、董必武住处,作为监视、控制重点。在这些目标附近设立监视哨所,昼夜守候、盯梢,逐日上报情况。对于拜会中共代表的人员进行跟踪、调查、威吓,甚至绑架、暗害。1939年,国民党军委会驻扎綦江县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忠诚剧团,因演出《李秀成之死》,被视为“宣传共产党思想”。由教育长桂永清报经蒋介石批准在战干团清查“共产党组织”。他们采取严刑逼供、栽赃陷害等手段,杀害与活埋抗日青年260余人,拷打致残40余人。死者的财物和书信全被该团政治部主任腾杰、总队长杨厚灿、肖劲等人侵吞或销毁。对外则谎称这些学生已分赴前线抗日。1940年,四川发生灾荒,成都市米价暴涨且供应奇缺,引起群众愤怒抗议。省会警察局长唐毅为了镇压群众闹米风潮并借机镇压共产党,于3月14日唆使一批流氓带头到一些粮店抢米,造谣诬陷是共产党煽动闹事。当日即将到现场采访的《时事新刊》记者、共产党员朱亚凡逮捕,冠以指挥抢米“首犯”罪名,绑到西门城墙下枪杀。接着,出动特务、警察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查封

了《时事新刊》和《捷报》社，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及“共产党嫌疑分子”数十人。军统局长戴笠专程赶到成都，指挥刑讯逼供。后将中共党员洪希宗、薛特恩、唐介舟等10余人，押到龙泉驿山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解往重庆军统总部看守所，后转押至贵州息烽监狱，1946年8月杀害于重庆磁器口附近松林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被迫接受“和平建国”方针，同意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特务竭力捣乱破坏，策划制造了沧白堂事件，非法搜查了政协代表黄炎培先生住宅。1947年2月10日，在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方治的策划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警察800余人，冲进“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场，包围主席台，抢夺扩音器，制造混乱，乘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60余人。接着驱赶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查封《新华日报》、新华书店和一切民主革命团体。中国劳动协会公开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建国的主张。1946年8月6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带领大批警察占领“劳协”重庆办事处、工人福利社、劳协医院和美工堂电影院，搜查了各处办公室和职工

宿舍，逮捕了福利社主任周颖等劳协职工38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同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了《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法》，禁止一切群众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严禁妨碍戡乱的言论和宣传。四川省奉命建立省、市、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勒令机关、学校、工厂、行业等一律建立“防谍小组”，形成了以特务机关为核心，党、政、军、警总动员的反共、剿共体制。

1947年6月1日夜，重庆、成都两市实行戒严。成都由省特委会秘书长李白英，川调室主任邵平、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稽查处长周迅予等，指挥特务、警察逮捕了共产党员杨伯恺、于渊、民盟成都地区负责人田一平、王伯高，以及《华西晚报》编辑孙文石等60余人。重庆市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统一指挥特务、警察和宪兵，包围各大专院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250余人。1948年初，徐远举出动近千名特务、警察，编成273个调查小组，侦破中共地下刊物《挺进报》。4月1日，发现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文城出版社”，抓捕了负责人任达哉。任叛变后，带领特务抓捕了领导人许建业。接着特务进行守点监视、跟踪，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刘国定、冉益智叛变，供出了重庆市委、川东地委

和川康特委负责干部名单,致使1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1949年1月,徐远举派军统特务雷天元、叛徒刘国定组成川西特侦组,到成都进行破坏活动。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于14日抓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特委委员华健及荣县、威远地下党负责人韩三思。蒲华辅叛变,供出了川康特委军事委员韩子重、交通员王文鼎及协进中学校长傅茂清夫妇等17名共产党员。川西和西康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国民党政府临近覆灭时,于1949年8月8日再度迁都重庆。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先后来川,直接策划布置“应变”阴谋。从台湾基地空运特务经费、电台和爆破器材,调来一批潜伏台长和一个爆破队在川康地区广布特务潜伏组织,并准备炸毁重庆、成都城市设施和兵工厂;规划了游击基地,组建了游击武装部队,准备负隅顽抗;对于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

士进行屠杀、活埋。从9月6日起,特务机关先将杨虎城将军及其秘书宋绮云夫妇杀害在白公馆附近松林坡。10月28日夜,杀害陈然、王朴等共产党员10人。11月14日又杀害江竹筠、齐亮等30人。11月27日下午,将爱国将领黄显声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枪杀于步云桥。当天夜里又把关在白公馆的26名共产党员全部杀害。同时,对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房焚尸。12月4日,成都特务机关将关押在稽查处的进步青年彭代梯等3人,押到抚琴台一座古墓墓道内刺杀。7日夜,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指挥特务将共产党员杨伯恺、于渊、王干青、晏子良等32人,押到成都通惠门十二桥防空壕内刺死,然后用石灰浆毁尸掩埋。四川解放前夕,特务机关在全省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一万余人。

第二节 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前,四川地区(含原四川省、重庆、西康省)封建势力雄厚,土匪恶霸多,反动军阀多,帮会头子多,烟客赌棍多,流散武器多,素有“五多”之

称。四川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经营的重要地区,国民政府和四川军阀狼狈为奸,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残酷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血

案”、“惨案”。

四川解放初期,大量溃散于此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及其有组织的“游击武装”,溃散的散兵游勇,起义后又反叛的原国民党部队,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刑事罪犯(重庆市即放出1000多名),纠合在一起,乘人民政权初建时期,进行猖狂反扑,紧密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国民党“反攻复兴”的叫嚣,各种名称的匪特武装四处暴乱;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疯狂地进行暗杀、纵火,放毒、抢劫等破坏活动,破坏生产和交通,扰乱社会秩序,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段时间,许多区乡政权被破坏,数十座县城被攻占,县级机关被迫撤离;许多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被杀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大量财产被抢劫焚烧。仅川南行政区从1950年1月至4月,即发生匪特暴乱104起,匪众达26万余人,古蔺、兴文、屏山、雷波、马边、沐川等6个县城一度被匪特武装攻占,有的长达4月之久。川西区1950年2月至4月发生暴乱103起,10余座县城被攻占,4800余名党政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及人民群众被杀害。

各级人民公安机关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及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部署,在配合人民解放军全面开展剿匪斗争的同时,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政、警、宪、反动党团组织和人员的情况,进行全面接管、清

查,开展侦察破案,查获了一批潜伏特务组织,集中搜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缴获了一大批弹药、武器、电台和活动经费。同时,各地发出布告,通令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停止活动,过期不登记的则依法制裁。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击处理,虽然削弱了残余反革命势力,但是,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偏向。一些反革命分子更加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普遍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甚至埋怨人民政府“首恶不办,胁从不管”,这就脱离了群众。使得许多地方群众难以发动,不敢与反革命分子作直接的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难以巩固。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为了保证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必须克服“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中央公安部随即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部署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镇压反革命以法律武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市、西康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立

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吸收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参加,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康省的镇反运动只在20个汉族聚居县进行。这次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通称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采取的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对于罪恶不大的胁从分子和向政府坦白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予以宽大处理;对于愿意立功赎罪的予以宽大和奖励。在镇反高潮中,对于有些罪该处死,但无血债,民愤不很大,或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罪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观后效;对于判处徒刑的罪犯,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劳动改造,使他们成为新人;对于虽然有罪,但可不判处徒刑而判处管制的罪犯,给以生活出路,采取行政管制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教育改造。

镇反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3年底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10月到1951年9月为第一阶段,镇反运动由发动到高潮,主要打击了公开暴露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

子。尤其是对匪首、恶霸的打击比较彻底。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巩固和扩大镇反成果,深入开展斗争,继续打击残余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11月到1953年底为第三阶段,重点进行了取缔反动会道门,肃清暗藏在水上和边沿地区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追捕逃犯等工作,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四川各地认真清理、检查了四错(即错捕、错押、错关、错杀)的情况。全省共平反“四错”案件56件。之后,又根据中央制定的有关标准,逐级对五个方面反革命骨干分子的打击和群众发动的情况、执行镇反政策的情况进行镇反判定。经过镇反判定,被打击、处理的反革命骨干已占原有总数的98.45%。1953年9月西南公安部视察组到四川视察镇反后,认为:“四川省不仅打击了五类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充分发动了群众”。对四川镇反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期三年的镇反运动,严厉镇压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血债累累、怙恶不悛的“南霸天”、“北霸天”以及残杀爱国将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基本肃清了浮在面上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妄图在大陆复辟反动统治的阴谋。与此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两者相结合,彻底解除了国民党统治阶级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压迫和经

济压榨,人民真正翻了身。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扫清了民主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证了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镇反运动的全过程是在中共四川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运动的每一阶段,党委都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实际,周密计划,精心指导。运动中,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并且把镇反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参加讨论对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责任感;通过召开不同规模的群众诉苦会、控诉会、公审会,组织群众倒苦水、诉冤仇,激发了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的积极性,使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在运动形成高潮时,注重了检查政策落实的情况,及时发现和防止了大捕大杀“左”的偏向,当有的地方发生简单草率,刑讯逼供,违反政策现象的时候,立即组织政策检查,坚决及时纠正,实事求是地平反假案错案,妥善处理善后,严肃处理犯错误的干部,防止假错案件的扩大,取得了社会同情,使镇反运动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进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公安机关担负了调查、缉捕、预审、看押和监管反革命分子的繁重任务。1955年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时,四川在省委领导下,又开始了一次镇反运动。这次运动

的重点是打击隐藏在边沿地区和落后乡、村基层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各地组织大批干警,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段准备,分期分批开展集中搜捕。从7月10日到8月底,全省共逮捕4000余人。破获了一批破坏粮食统购、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和阴谋暴动的案件。改变了落后乡、村的面貌。但是,也有发生工作不细,乱扣乱关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少数干部挟嫌报复,逼死人命的严重事件。据九月份对98个县进行检查,错捕的人占总数的1.8%。各地都及时作了纠正、处理。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四川是反动会道门滋生地之一,势力雄厚,名目繁多。解放时,有一贯道、归根道、同善社、红灯教、高峰道、孔孟道、奇缘会、万全堂、乾元堂、西华堂等10个道种,使用140多个名称在全省各地活动,道坛、佛堂遍布城乡各地,受骗道徒达百万余人。它们编造道源、道统,塑造崇拜偶像,自立祖师、门派,制定道规、道层,以祖师为“神圣”,以大道首为核心,中小道首为骨干,利用一些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和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弱点,采取摆坛请神,画符、降谕,赐丹治病,驱邪抓鬼等迷信手段,欺骗胁迫信徒发誓立愿,捐财免灾,献身办道,修渡来世等,控制道众压迫群众,诈骗钱财,奸淫妇女。解放

后,反动会道门勾结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十分猖狂。他们不断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制造妖言、谣言,散布“变天”思想,蛊惑人心,煽动群众对抗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疯狂进行纵火、投毒、暗杀等恐怖活动,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1950年8月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发布《取缔封建会道门命令》,勒令会道门解散组织,停止活动。各地公安机关结合镇反运动,对反动会道门的历史演变、政治背景、组织状况和现实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侦查破案,逮捕重要道首1000余名,打乱了各种反动会道门的指挥体系。鉴于成都从1946年起便成为“一贯道”的全国指挥中心,川东地区红灯教暴乱活动嚣张,川西、川东公安厅率先对这两个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取缔。

1951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再次发布命令,指示各地对反动会道门进行全面取缔。四川、西康省和重庆市,按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于1952年冬至1953年春,大张旗鼓地对反动会道门进行全面取缔。这次取缔工作从会道门总堂、支系所在的重点市、县开始,由城镇到农村,由交通沿线到边远山区逐步展开。各地首先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摸底和各项准备工作,确定当地应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和第一批应逮捕的道首名单。接着由市、县人民政府发出取缔布

告,对反动会道门明令取缔,立即采取集中行动逮捕重要道首,查封道坛、堂口,收缴道具,限令中小道首和骨干分子向政府自首登记。对其中罪大恶极的道首,由人民法院迅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各地报社、广播电台发表取缔工作新闻、专稿、社论和评论文章,城乡各地通过黑板报、扩音器、街头演讲、花鼓、快板、话剧、金钱板等各种形式,揭发、控诉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对群众广泛宣传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意义和方针、政策,揭露会道门的反动性、危害性和欺骗性,号召广大道徒提高觉悟,主动声明退道,积极投入同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缔所有道坛和堂口,依法逮捕了暗藏的首恶分子,对中小道首普遍进行了登记。在取缔工作中,坚持“打击惩办少数首恶,教育改造多数,挽救广大被骗群众”的政策,使绝大多数道徒认清了会道门的反动本质,声明退道,脱离了反动会道门组织。截至1953年底统计,四川、西康和重庆市,共逮捕道首38440余人,登记自首的中小道首135730人,近百万受骗入道的道徒声明退道,基本上摧毁了反动会道门组织,大大削弱了其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反动会道门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封建势力,它们的组织活动的社会根源一时不易完全清除,而且一些道首漏网潜逃,活动更加隐蔽。全面取缔工作

结束以后,一些残余支系和漏网道首,采取打破门派,改头换面,借尸还魂等方式,互相纠合,图谋东山再起。一些受过打击处理的道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恢复发展组织,不断进行复辟破坏活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反动道首和虔诚道徒,利用社会动乱,勾结一些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大肆造谣破坏,鼓吹改朝换代,80年代以来,少数残余道首打着“宗教”旗号,利用部分群众中封建迷信思想流行,发展基层干部和青少年入道,妄图“传宗接代”,永存祸根。公安机关一直把

侦查、打击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作为政治保卫工作一项重要任务。一经发现就及时侦查,获取罪证后,依法坚决取缔。30多年来,共破获反动会道门复辟案件1000多起,其中封帅、拜相,密谋暴动推翻人民政权,改朝称帝的,约占40%。通过侦查破案,逮捕了一批进行复辟破坏活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取缔了死灰复燃的反动组织。同时不断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行,教育群众提高觉悟,使反动会道门的复辟阴谋不能得逞。

附：四川会道门组织简况

一贯道 别名西华堂、崇华堂、明一贯道、明道、中华道德会、三教会、先天道、天道、天理道、真天道、天真道、空明道、无生老母道、无为道、红阳道、明礼道、明圣道、天官道、天仙道、中央大道、中庸道、中贤道、中善道、孔圣道、真一道、真理道、性理道、观音道、老母道、弥勒教、济公道、纯一道、诚一道、圣贤道、玄天道、皇经道、理化道。总道首张天然,又名张光璧,自称济公活佛化身,弓长老祖转世。1934年,张天然与山东单县女道首孙素贞(号月慧)密谋,设坛请神,诡称“上天传谕,令济公与月慧结为夫妻,共传一贯大道,普渡众生”。从此,一贯道有了师尊、师母两位祖师。1937年,张天

然、孙素贞移居天津,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日军侵华工具。1940年,张天然派张润田、何侗文、白兰斋等道首潜来四川发展道务,收集抗日后方情报,为日伪效力。1945年,张天然、孙素贞投靠国民党,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称作掩护,继续在全国发展道徒。1946年,张、孙率大批道首迁居成都,图谋实现其“东修西成”,借道篡国的野心。1947年农历八月十五,张天然病死成都,一贯道分裂为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和以张英誉为为首的师兄派。孙素贞掌握了一贯道主要势力,她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师母公馆,指挥全国各地道首大肆发展反动

势力,配合国民党积极反共。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道首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直至被全面取缔。

同善社 原名礼门,别名中和道、同善堂、福善堂、武善堂、三教合一会、道德慈善会,大约1850年由贵州传入四川。1907年永川人彭太荣(字汝尊、号述古)继承道首后,改道名为“同善社”。1917年11月,北洋政府批准同善社为慈善团体,数年之间,同善社分号遍及许多省、州、府、县。1929年,彭述古制作皇袍、玉玺,阴谋暴动称帝,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保皇党”予以查禁。抗日战争时期,同善社投靠日伪政府,设立“大刀会”练功习武为日伪效力。1945年冬,同善社总号及各正号设立“辅国坛”,专门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反共。1948年冬,彭述古、李乃斌召开全国道首会议,部署各地同善社与国民党配合,取得武器弹药,扩大“大刀会”力量,对抗解放军。四川是同善社指挥中心,解放后组织武装暴乱,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归根道 原名归根堂,别名三教同源会,云南居士林、太极道、皇极道、无极道、归一道、真空坛、先天归根道、复命归根道、明德慈善会、询德慈善会、快上慈船。总堂设在云南。1929年,传入川西北地区,总道首耿其昌封夹江人张正良为火公,掌管道务。另一道首王玉瑞自立门派,在川东南发展道徒,1931年在重庆设立总堂,先后封王应

龙、岳鸿儒为祖师。1938年,岳鸿儒打出“快上慈船”道名,迅速发展。1948年,耿其昌与岳鸿儒合议,统一道务。解放后,归根道散布“三期末劫来临,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共产党只有两年天下”等谣言。勾结特务、土匪,进行武装暴动,破坏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红灯教 又名顺天教、盖天教、万仙坛、镇国军、刀儿教、青沙教、黑沙教、朱沙教、松杉教、黄坛教、大刀会、长矛会、长毛会、联英会、峨眉少年派、十全道、大刀队、扇子队、神兵队、云沙道、三教坛。红灯教有彭县肖华山创立的红灯教派;垫江县李凤全、李中全发起的顺天教派(后称刀儿教、神兵队)和威远县陈玉庆建立的万仙坛派,其共同特点是:收徒习武,教练“撒豆成兵、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刀枪不入”等妖术,长期结帮为匪,占山为王,进行奸淫烧杀或打家劫舍,梦想篡国称帝。解放初,红灯教在各地进行反革命暴动,杀害大批区、乡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有的纠集数千名“神兵”攻打县城和袭击运输车、船,伏击人民解放军。

孔孟道 又名儒门先天大道、圣贤道、儒道、选天大道。孔孟道,1910年创立于四川威远县。1925年,教主刘从云由刘佛澄引见刘湘,两人互相勾结利用,图谋以神治军,建立刘氏江山。1934年,刘湘任命刘从云为“前方剿共委员会”委员长,围剿红军。因其

以巫术指挥打仗,使所属5万兵马被红军击溃。刘从云从此转入民间传道,1949年底,孔孟道组织“川西南游击总队”与解放军对抗,解放后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高峰道 又名龙门正道、龙门正宗派、伦常道、祖道门、三清门、玄道门、玄门、默朝门、大南山道、五房道、五方道、五字道、五字教育会、震旦崇德会、一德慈善会、玄坛胜会、三教坛、不言教、清佛门、清玄门、老君教、尽七会、二十会、道德会、大成会、劝善辅导会。祖师范云丰、勾结军阀、政客,拥蒋反共。1935年,红军长征入川时,在川北地区大肆散布谣言,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抗日时期,编印经书、谕文,鼓吹“唯有拥蒋反共,敬神修道,国家才能太平”。解放战争时期,散布谣言、妖言,诬蔑共产党是祸根。1949年,组织反共救国军、救国团、大刀会、刀儿队等武装力量,抵抗解放军。解放后继续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奇缘会 又名奇缘法会、普渡门、四川省静宁寺慈善联合会、川东南慈善联合会、昭明慈善会、同佛慈善会、兴隆慈善会。1919年创立于四川省威远县静宁寺(原名“高庙子”)。祖师朱郑氏,自称“观音王佛化身”。1926年,泸州人先培周、袁哲明将道传至重庆、成都,取得21军军需处长贾文泰、24军税捐处长朱乐夫、重庆商会会长石荣延等人支持,将奇缘会改名“慈善

会”,在川东、川南地区广收道徒。1935年,国民党利用奇缘会以慈善团体名义,到川北根据地代发救济,暗中收集红军情报和进行造谣破坏。1936年,因其侵吞救济款项和聚集数万人装神闹鬼,惑众敛财,被四川省政府勒令查禁。1946年,以巨款收买省政府社会处官员批准解禁,对外改称“四川省静宁寺慈善会”,在中统特务洪明扬操纵下,恢复传道活动。解放后,该道利用扶乩降谕,编印反动经书、谕文,咒骂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煽动道徒“反共护道”,破坏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

万全堂 又名先天玄关大道,万缘堂、观音老母道、普渡门、清佛道、明德堂、中道堂、无生老母道、瑶池道。大约1907年创立于四川重庆,第一代家长万道全。第四代家长夏炳先精于经商,将所诈骗的钱财开设货行、商店(仅重庆即有十大商号),使万全堂具有较大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交往。1926年,收买、拉拢21军筹备处长甘绩镛、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开办同德书房、印经馆和讲道班,向全国各地投寄、散发,并派道首前往经商传道。万全堂设有上下两个总号。上总号在重庆大田湾,掌管四川、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山东、两广道务。下总号设在汉口胜利路,管理湖北、湖南、河北、江苏、安徽、吉林、福建等省的传道活动。1944年,第五代家长顾道鑫秘密投靠

日本特务机关,并派雷仁厚、龙彩云等人扮作难民,到滇缅边界为日本收集盟军情报。1948年,顾道鑫与中统特务勾结召开全国道首会议,决定将各地堂口改为“慈善团体”,或以开办工厂、商店为掩护,转入地下活动。四川是万全堂的发源地和指挥中心。解放后,万全堂大肆造谣惑众,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乾元堂 又名瑶池道、小西天。大约1907年在成都建立。第一代家长肖道和,继任家长松运冰、朱甫善、傅明善、严永德、陈士清、黄昌清、高海清。高海清四川内江人,长期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一贯宣扬“拥蒋反共,兴教救国”。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召集全国道首举行“家庭聚会”,分析政治形势,研究反共策略,写成《家音》传书,指导道务活动。解放后,乾元堂一批道首以血书宣誓:“拥护蒋委员长,坚决反对共产党”,指示各地道首秘密潜伏,巩固组织,待机再起。

西华堂 又名西华瑶池道、瑶池门、一善堂、西华道、皇经坛。大约1907年创立于重庆,宣称一代祖师为蒋素玉、蒋素阳。民国初年分成两派。林子常的老西华堂迁到成都东大街牛王庙,后将道盘传给义女林瑞卿(真名余养惠)。符辉山的新西华堂总堂一直设在重庆。新老西华堂长期勾结军阀、特务,散布妖言邪说,诈骗群众钱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后,指示各分

坛道首,拒不登记悔过,窝藏特务、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政府法令。“坚决同共产党对抗,必要时可以投毒、纵火,使政府不得安宁”。

三、侦破特务、间谍案件

1. **侦破特务潜伏组织、电台** 重庆解放伊始,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力宣传、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肃反政策,号召特务、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1949年12月6日下午,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向公安机关自首,交出特工电台二部、毛瑟手枪1支、黄金20两及一批秘密文件。次日,又引来潜伏台长邹俊明、黄岫自首,各交出电台1部、密码1本和潜伏活动经费。12月8日,国民党挺进纵队司令张钧投案,交出电台1部。接着又侦破了国民党“内调局”潜伏组、台,逮捕了彭衡等3人。挖潜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川西和成都市公安机关,根据当地解放前夕,从外地逃来特务很多的情况,肃特工作采取了“麻痹,稳住,防止敌人跑散”的方针,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毒攻毒,以特制特”的策略。1950年1月18日,川西公安处和成都市公安局,根据原地下党组织提供的线索,派人到安县劝说保密局蓉站副站长、川陕甘边区特别潜伏站站长刘鉴先投案自首。刘交出了电台、密码本及活动经费,交待了广元独立潜伏台情况,并主动写信叫台长李云龙

携台来成都投案自首。在刘鉴先等人的协助下,先后破获保密局成都第一、二、三潜伏组台、邛崃潜伏台、简华潜伏台等,捕获组台长胡察秋、赖立之、杜祈、陈朋、李维中。后又逆用西北逃来的西安绥署二处密勤组长谢璇、人事组长杜云砚和三科科长蓝倬,破获了西北督导组潜伏台、陕西潜伏站和豫西潜伏台,逮捕重要特务郭石生、蒋仁安、王宪民等18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电台、密码本等。1950年,仅川西及成都市公安机关,便破获潜伏、游击组台26个,其中属保密局系统15个、国防部二厅9个、内调局和宪兵特高组各1个。同一时期川东公安厅侦破了保密局綦江潜伏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丰都潜伏台;川南公安厅破获了泸州、宜宾潜伏台;川北公安厅破获了国防部二厅华蓥山潜伏台;西康省公安厅侦破了保密局康定、雅安、西昌潜伏组台。深挖潜伏特务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各级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和专案侦查,又陆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组、台。川康地区和重庆市公安局共破获国民党各特务系统部署的潜伏组织1076个,基本上肃清了敌特机关的潜伏组台。

2. 侦捕重要特务、反革命分子 1950年3月5日,宜宾县公安局侦悉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隐匿在县城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鲁愚家中,6日晨发现王乘永利号轮船向重庆逃窜,当即电

告江安县公安局堵截,于下午8时在江安轮船码头将王陵基捕获,押送西南公安部处理。该县公安局还查明四川省特委会秘书、成都十二桥血案策划者之一罗慧开,化名李正泽,隐藏在商州乡龙泉小学,将其逮捕归案。同年12月31日,乐山公安处侦悉内调局川调室主任先大启,化名朱云清,隐藏在洪雅县禾生打米厂,随即捕获。宜宾县公安局还于1952年侦查捕获了军统少将特务、局本部“中共科”科长和“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子明。重庆市公安局经过周密调查,接连捉获保密局少将督察徐建国,“青年反共救国军”中将司令沈铁汉,兵兵特高组组长曾恒之,蒋介石侍从室少将护卫、重庆市警察局督察长舒栋材,较场口事件元凶之一吴人初,内调局渝调处分区主任、较场口事件现场指挥谢雨樵,内调局专员颜鹤泉以及大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等。西康省公安机关先后捕获保密局康定站长谭兴沛,西昌站长陈自平,国民党西康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杨仲华,民社党西康省委委员张为英,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副所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丘山等。川西公安机关在剿匪斗争取得胜利后,决定以侦察追捕毛人凤委任的特务游击司令为重点,大力加强了追捕漏网特务骨干的工作。先后捉获了“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保密局蓉站站长杨超群,第六纵队司令、保密局西昌站长

田动云,第五纵队司令、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龚速度,国防部少将部员郭怀卿,民社党重庆市党部主委张帮烈,郑州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王益三,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要犯王子民等。毛人凤任命的第三游击纵队司令、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解放后率部窜入阿坝藏区,勾结国民党专员何本初、师长傅秉勋等,进行武装割据,并用电台向台湾当局报功请奖,被加封为“川康甘青反共突击队”总司令,疯狂顽抗。直到1953年其匪部被全部歼灭,由阿坝大头人华尔功臣烈将周迅予一伙特务分子送交人民政府惩处。至此,毛人凤委任的特务游击司令,除第一纵队司令何龙庆逃往台湾外,全部被擒。

3. 侦破特务派遣案件 1954年起,反特斗争重点转向侦破境外特务、间谍的派遣案件。国民党逃到台湾后,继续坚持反共宗旨,长期与美国间谍机关勾结,向内地进行派遣、情报活动。四川公安机关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侦查部署,以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为重点,加强了同敌特派遣、情报活动的斗争。1955年、1956年,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12件。1957年台湾情报局派遣“全能特务”刘智群潜回四川活动,阴谋发展特务,收集情报,架设特工电台。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其活动踪迹,进行严密控制、侦查,取得确凿证

据后,依法将其逮捕。

60年代前期,公安机关针对派遣特务“快进快出、得手就跑”的活动特点,适时运用了“布网迎敌、快侦快破”的对策,先后捕获台湾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特务黎光碧(女)、吴建平、卢圉生等。1965年8月,美国驻泰国间谍机关派遣谷中源从中缅边界潜入内地活动。谷在一个月内快速流窜昆明、贵阳、重庆、宝鸡、兰州、玉门、西宁、成都等地,沿途收集中国原子弹爆炸及国防三线建设情报,图谋得手就跑。四川公安机关9月6日发现线索后,迅速严密布网,依靠铁路、公路、航运、邮电部门职工及各地公安保卫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昼夜盘查堵截,寻踪追迹,于29日晚即在石棉县将谷中源捕获,收缴了其随身携带的密写工具、情报资料、伪造证件、活动经费等全部罪证。

70年代后期,公安机关恢复正常运行后,1976年3月,省公安局和成都铁路公安处联合侦破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抓获间谍分子柳元良,缴获显微镜、放大镜、密写工具及留下来的情报底稿等罪证。

80年代,四川公安厅建立了国家安全处,主管反间谍、特务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力加强侦查业务建设,开展调查研究、灵通情报信息,及时发现侦破了一批特务案件。1980年成都市公安局侦破了台湾情报局派遣特务案,主犯陈恩雪于1978

年逃往缅甸景栋,参加特务组织,潜回成都发展特务3名,图谋建立从成都到芒市的秘密交通线,长期收集输送情报。1983年5月,甘孜州公安处侦破一起特务派遣案。特务牛麦,藏族,新龙县人,早在1960年即被台湾情报局驻印度特工组织招募,曾被委任情报组长,多次派到中印边界刺探情报和散发反动宣传品。1982年,牛麦潜回原籍进行特务活动,公安机关在侦清案情和获得罪证后,对牛麦进行传讯教育,促使其彻底坦白悔过,免于刑事处罚。1986年8月,成都市公安局侦破了台湾情报局“区内发展”案。台湾驻缅特务赵文林于1985年7月潜来成都,发展了其舅父毛建明、毛建国,布置他们收集情报和发展特务,以后又派特务吴宝英、潘东旭两次来成都向毛等送交经费和传授密写技术,索取我中央机密文件等情报。吴、潘沿途又用色情勾引发展了现役军人张成良和西昌运输公司工人周明伟。破案中缴获收听特务电台广播的收录机和密写工具、密码本等。公安机关对参加特务组织的人员,根据罪恶大小、认罪情况和立功表现,分别进行了处理。1987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侦破了台湾“军情局”派遣特务案。特务余汉生原是“渝穗装饰材料公司”业务员,在其表妹夫陈良基策动下偷渡香港,参加台湾情报局特务组织,接受了特工训练,被委任为“重庆情报站少将站长”。

余采取金钱收买和色情勾引手段,拉拢多人参加特务组织,均被拒绝、举报。他还数次向特务机关密报了重庆建立国家安全机构及少数学生串联、游行等情报。破案时搜出特务经费、密写工具、密码底本等活动罪证,依法将余汉生逮捕。1989年9月,成都市公安局破获了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派遣特务案。特务周仁贵原是四川省经贸厅副处级调研员、中共党员,1985年辞掉公职,自动脱党,寻找门路捞钱。他窜到广州与台湾驻港特务韩某约会,参加特务组织,领取活动经费,返回成都曾多次向特务机关报告成都动乱时“民主运动”等情报。破案时缴获了情报底稿三份,密写药粉一包,特用收录机一部,依法将周仁贵逮捕。

四、侦破现行反革命案件

四川公安机关对于反革命犯罪活动,坚持依靠群众,加强调查研究,采取“侦防并举,力侦速破”的方针,及时破获了一大批现行反革命案件,有力地制止和减少了危害,保卫了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

50年代初,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势力,疯狂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大肆制造谣言,散发反动标语、传单,投寄恐吓信件,进行纵火、投毒、暗杀活动,发展反革命组织,收集枪支弹药和各种凶器,抢劫公私财物,袭击执勤部队和工作干部。甚至密谋暴动,攻打县城和区

乡人民政府,妄图推翻建立不久的人民政权。公安机关针对反革命分子的严重破坏活动,采取了“速侦速破,严厉镇压”的方针,给了敌人迎头痛击。1950年至1955年,当时的重庆市、西康省和四川四个省级行政区公安机关,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阴谋破坏案件。其中有英国间谍福特勾结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边使拉鲁,谋杀西康省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案;重庆“中国平民党”和“自由联盟”案;川北“四盟党”和“四国联盟反共救国军”案;川东的“反共救国军”和“侠南师”案;川南的“忠义救国军”和“川中游击纵队”案;川西的“西南光复军”等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还有向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重庆市长投寄恐吓信件的反革命挑衅案件。这些案件的及时破获,打退了残余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1951年至1953年,全川公安机关还结合宗教“三自”爱国运动,逐步取缔了“圣母军”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于1948年指挥爱尔兰人莫克勤在上海建立的。1949年,莫克勤到四川万县、重庆、成都等地,召见了天主教一些主教、神甫,布置他们在教会内迅速发展“圣母军”,使其成员“打入每个社会角落,进行千变万化的工作,准备同共产党作殊死斗争”。四川解放后,“圣母军”改名“圣母慈爱祈祷会”,大量散发反共书刊,制

造谣言,煽动教徒仇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破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当中国天主教徒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时,“圣母军”更是竭力破坏。他们打击爱国神职人员,迫害中国教徒,甚至煽动和支持反革命武装暴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人民政府根据广大天主教徒的举报和要求,依据国家法律,取缔了“圣母军”4个区团和80个支团,驱逐了一批对抗中国法令的“圣母军”外籍司铎、团长,逮捕了一批犯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一般团员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后免于追究。通过打击“圣母军”的破坏活动,保卫了“三自”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

6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四川少数反革命分子认为复辟时期已到,便与境外敌人遥相呼应,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人民内部矛盾,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甚至串联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抢劫、凶杀,举行暴动。省公安厅根据当时严峻形势,紧急布置全省公安机关,严密掌握敌情动态,加强侦察破案,及时揭露、打击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在破案处理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就地改造”的政策,严厉镇压了少数煽动暴动、闹事,进行抢劫、行凶的首犯;对于受骗和被迫参加反动组织的人,一律不按反革命分子对待,教育他们检举、揭发反革命首犯

的破坏罪行,吸取教训、安心生产自救。

“文化大革命”中,台湾特务电台昼夜进行反动宣传,四川省内一些反革命分子乘机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纠合串联,发展反革命组织;书写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投寄匿名恐吓信件,甚至按照敌台广播的通讯地址投寄密信,索要活动经费和武器、电台,进行特务活动;少数反动会道门道首重操旧业、积极恢复会道门组织,利用封建迷信,图谋暴动当“皇帝”。红灯教头目周千云、袁正六,在云阳双河区招收“神兵”100多人,教练“腾云驾雾、刀枪不入”等妖术。周千云自封“天王”,封袁正六为“军师”,赶制了大刀、长矛、宝剑和红色“神衣”,他们高喊“斩妖祭神,兴周灭纣、忠心保驾、复帝还古”等反动口号,于1976年10月5日举行暴动。他们杀害干部、群众5人,砍伤5人,纵火烧毁房屋9间、粮食5000余斤。由于当时公安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案件未能及时侦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各级公安机关迅速恢复了职能,加强了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侦查、打击。

80年代,现行反革命案件大幅度减少,发案率比70年代下降约80%。但是,反革命活动伎俩更加诡密狡猾。

一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外出做工或经商,跨市、跨省串联发展反革命组织;有的打着“理论探索”、“文艺争鸣”的招牌,网络反社会主义分子,投靠、勾结境外反动势力,破坏国家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一些反动道首与境外邪教头目勾结,假冒“宗教团体”掩人耳目,暗中进行复辟、渗透活动,图谋卷土重来;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躲在甲地书写、印制反动标语、传单、信件,窜到乙地进行张贴、散发、投寄,妄图制造混乱,逃避打击。各地公安机关根据敌情变化,把掌握情报信息放在政治保卫工作首位,加强了地区、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提高了发现和侦控敌人的能力,对隐蔽敌人的破坏活动,及时给予了揭露打击。1982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秩序不好,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破坏。从1983年起全省政保部门围绕“严打”斗争,连续多次开展了侦查破案战役,90%以上的案件得到破获。经过几年的侦查打击,1987年、1988年,反革命案件明显下降。1989年,在发生政治动乱的影响下,反革命案件再次回升,全省公安机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平暴治乱”的指示,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和侦查破案,严厉打击了反革命罪犯。反革命案件大大减少。